关于张名振的死因,史籍记载有两种说法:一是积劳成疾,因病而死;二是被郑成功指使人毒害致死。本传从后说,详见拙著:«张名振史事释疑»,«清史研究通讯»1685年。

㉑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16,«张名振题诗金山»。案:诗序称接济秦藩,秦王是孙可望,不是李定国.李定国虽领兵作战,因地位在孙可望下,所以仍称接济秦藩。

㉕查继佐:«罪惟录»传卷12,«张名振传»。

㉖张煌言:«张苍水集»第1编,«冰槎集»,《祭定西侯张侯服文》(1661年)云:"回念乙未之冬,弃捐宾客,距今仅七载耳。其间废存亡之感,月异而岁不同。如我兄既归三尺土,而尚不能保百年坟,致有发冢开棺之变。余闻之痛,何可言哉"。中华书局1959年版。

清史研究评介

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和庋藏

冯佐哲

宝卷是我国明清以来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传教的经卷,是一种仿佛经式的经卷作品。宝卷一词在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清代晚期,宝卷从华北地区流传到大江南北,成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脚本。宝卷是今天研究宗教史、民间文学史、民间思想史、农民战争史的重要资料。因此,它日益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现将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与庋藏情况简介如下。

宝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它是由唐、宋的仿佛经的"讲唱经文"、佛经故事的"变文"与"说经"等演变而来,其间还杂糅了元明时期的散曲、鼓子词以及诸宫调与其他戏曲形式,至明代中叶才正式形成了宝卷。

明代中期以后,宝卷逐渐成为秘密宗教的经典。最早多流行在永平府靠近长城沿边地区,后来扩展到华北地区与江淮一带。如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三十二"人物"条中就记载了明代成化年间山西省崞县王良与析州封越利用秘密宗教起事,后为明官军俘获,搜其"妖书",其中仅记述的目录就达八十八种。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这些"妖书",就是宝卷,但可以肯定这些"妖书",就是宝卷一类的经卷。至正德年间,弘(红)阳教的经典就开始以"宝卷"命名,并刊行于世。至明代晚期秘密宗教打入宫内,许多太监、宫女甚至皇妃、太后也皈一左道旁门,例如,明末弘阳教就曾以魏忠贤、石亨、张忠、陈矩等为"护法神",明神宗万历的母亲当时号称"九莲圣母"。(李世瑜《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因此宝卷在明万历、天启至崇祯年间盛极一时,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开始中落,道光年间又开始抬头。宝卷在明清之际流传最广的是华北地区,特别是直隶省。由于时间流逝、苍桑变迁,保存至今的宝卷已寥若晨星,连同佚书目录加起来不过百数十种。如果划一时代的话,此为宝卷前期,亦称旧宝卷。

清代同治、光绪及至民国时期,宝卷又以新的姿态出现,是为宝卷后期,即宣讲宝卷(亦称"宣卷")。此时宝卷已由布道劝善,发展成为说唱文学的脚本,以演唱故事为主,甚至有的已成为纯民间文学的作品,只有少数还保持着宗教的意味,这时主要在江南,特别是江浙地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宝卷大约有五百种左右。

宝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是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1928年郑振铎先生在《小说月报》第17期号外发表了《佛曲序录》一文，介绍了三十八种宝卷，而且是作为佛教经典介绍给读者的。1934年向达（觉明）先生在《文学》二卷六号上发表的《明清之际宝卷文学与白莲教》(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白莲教的源流及宝卷的体例等。1948年傅惜华在巴黎发表了《宝卷总录》。解放后我国有关宝卷的研究随着秘密宗教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开创了新局面，人们更加注意了宝卷的史料价值，发表了不少论著，有关宝卷目录的书籍就出版了胡士瑩的《弹词宝卷书目》与李世瑜的《宝卷综录》等。

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下，日本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有关宝卷的搜集和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侵华的需要，对中国的民间信仰与民俗学等尤感兴趣，成立了所谓学术机关从事宝卷的搜集和研究，例如一九三八年九月，在近卫文麿内阁的支持下成立了日本国家调査机关——东亚研究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分所，任务之一就是搜集我国的宝卷。从此，不少日本学者纷纷来华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最著名的如井上红梅、大渊慧真、吉冈义丰、泽田瑞穗、仓田淳之助、高昌正三等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术界除了继续从事宝卷及秘密宗教的研究外，也开始把宝卷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其中主要有林传芳的《天地会的佛教性质》(《印度佛教学研究》1973年12月第22卷第 1 期)、相田洋的《白莲教的产生及其发展——中国民众的变革思想的形成(《中国民众反乱的世界》，汲古书院1974年版)、野口铁郎的《明清时代白莲教》（《历史教育》第12卷第 9 期）、《白莲的“教”和“术”》（《吉岗博士还历纪念，道教研究论集——道教的思想与文化》）、佐佐木正哉的《嘉庆年间的白莲教结社——林清、李文成集团的情况》（《国学院杂志》第77卷第 3 期）、安野省三的《严如煜与白莲教乱》（《生江论集》）、浅井纪的《关于道光青莲教案》（《东海史学》1976年第11期）、佐藤道郎的《佛教和革命活动——关于青莲教》(《东洋学》1977年第38号）、塚本善隆的《有关罗教的形成与流传》（《东方学报》京都第17册、）相田洋的《论罗教的形成和发展》(《续中国民众反乱的世界》，汲古书院1983年 6 月版）、吉冈义丰的《有关已故大渊慧真教授的遗业》（《东方宗教》1953年第 3 期）、吉冈义丰的《道教研究》（法藏馆1952年版）、泽田瑞穗的《吉冈博士的道教研究》（《东方宗教》1953年第 3 期）、《宝卷的研究》（采华书林1963年版）、《校补破邪详辩》（道教刊行会1972年版）、《增补宝卷研究》（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佛教与中国文学》（同前）等。在这些著作中，尤以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一书成就最大，可以说是一部宝卷研究承前启后之作，该书对二百多种宝卷作了摘要介绍，其中很多宝卷为作者个人所有，外人轻易不得一见。

宝卷在日本多为个人收藏，诸如泽田瑞穗、吉冈义丰、仓田淳之助等人收藏了大量的宝卷珍本，例如目前在国内很难见到的罗教经典——《五部六册》等就收藏在泽田先生手中。当然在日本的学术机关以及各大学中也收藏了不少宝卷，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就收藏有晚期宝卷的宝卷一百二十余种、原东京教育大学，今筑波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收藏着二十多种早期的宝卷影印件。

近年来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又新发现了晚期宝卷四十四种，是上面提到的日本侵华期间东海研究所上海分所在江浙地区搜集的，其中有：《达磨宝卷》，一卷，缘明刊本一册。《达摩宝卷》，一卷，光绪二十四年，胡思真重刊本一册。《延寿宝卷》，一卷，常郡乐善堂善书局刊本一册。《潘公免灾救难宝卷》，三卷，同治九年刊本一册，附《般若波罗密多心

经》。《潘公免灾救难宝卷》，三卷，咸丰五年序，刊本一册。《河南开封府花枷良愿龙图宝卷全集》，二卷，光绪年间，杭州西湖昭庆寺慧空经房刊本二册。《观音济度本原真经》，二卷，咸丰二年，上海翼化堂善书坊刊本二册。《韩湘宝卷》，二卷，光绪二十七年，杭城文宝斋刻字铺刊本二册。《观世音菩萨本行经》，一卷，刊本二册。《古佛当来下生弥勒出西宝卷》，一卷，赵源斋刊本一册。《湖广荆州府永庆县修业屠氏花杀宝卷》，二卷，光绪八年，陈春发，杭城玛瑙经房刊本二册。《江南松江府华亭县白沙村孝修回郎宝卷》，光绪三年，杭城玛瑙经房刊本二册。《杏花宝卷》，一卷，光绪五年，常郡乐善堂善书局重刊本一册。《明宋孝义达本宝卷》，二卷，光绪九年，许自然，杭城玛瑙经房刊本二册。《目连宝卷全集》，一卷，杭城玛瑙寺明台经房刊本一册。《目连卷全集》，一卷，刊本一册。《无上圆明通正生莲宝卷》，二卷，二本二册。《妙音宝卷全集》，一卷，杭城玛瑙经房刊本一册。《妙音宝卷》，一卷，光绪二十五年，愿学主人钞本一册。《妙英宝卷全集》，一卷，光绪年间刊本。《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咸丰五年，开封聚文斋刻字店刊本二册。《梁皇宝卷全集》，一卷，光绪二年杭州玛瑙房刊本一册。《梁皇宝卷全集》一卷（22）的重刊本一册。《梁皇宝卷全集》，一卷，杭州西湖昭庆寺慧空经房刊本一册。《山西平阳府平阳村秀女宝卷全集》，杭州玛瑙经房刊本一册。《清源宝卷》，二卷，光绪十六年，杭州玛瑙经房刊本二册。《清净宝卷》，一卷，胡清泉、朱永泉重刊一册。《雪山宝卷全集》，一卷，光绪二年，浙省西湖玛瑙明台经房刊本一册。《雪梅宝卷全集》，二卷，杭州景文斋刻字铺二册。《新刻十供神仙修真宝传因果全部》，一卷，民国十六年，常郡乐善堂书局刊本一册。《真修宝卷》，一卷，光绪十二年，周乐定重刊本一册。《灶君宝卷》，一卷，光绪十年，常州培本堂善书坊刊本一册。《消灾延寿阎王经》，一卷，光绪二十二年，苏城玛瑙经房刊本一册。《秀英宝卷》，一卷，光绪十五年，苏城玛瑙经房刊本一册。《修行明宗月微宝卷》，三卷，光绪二年刊本一册。《众喜粗言》、五卷、民国十八年，谢氏尚德斋刊本五册。《众喜粗言》，五卷，许乐记刊本五册。《太华山紫金岑两世修行刘香宝卷》，二卷，玛瑙寺经房刊本二册。《太华山紫金岑两世修行刘香宝全集》，二卷，同治十年跋，昭庆慧空经房刊本二册。《湛言宝卷》，一卷，咸丰六年，唐思恩跋，光绪二年，杭州玛瑙经房刊本一册。《张氏三娘卖花宝卷全集》，一卷，光绪三十年，祥兴斋刊本一册。《赵氏贤孝宝卷》，二卷，刊本二册。《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经两方宝卷全集》，一卷，玛瑙寺经房刊本一册。

一九八三年的美国《清史问题》

吴 伯 娅

一九八三年美国出版的《清史问题》第六月号和十二月号刊载了5篇论文、3篇译文，以及数则消息。

帕特丽夏·埃比雷的《清代宗族的类型——重新考察桐城张氏》一文，研究了张英的宗族，张淳、张秉彝、张英等人向宗族捐赠土地的情况，对希拉里·比蒂的《土地与宗族——明清安徽桐城县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张氏宗族与广东